

13.04



革命回忆录选编

莆田建党六十周年纪念

中共莆田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前 言

自一九二六年初，党中央派陈国柱同志来莆田创建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莆田特别（党团混合）支部，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周年了。六十年来，党领导莆田人民进行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建立了人民政权，被誉为“红旗不倒”，在福建地方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党又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变莆田的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建设和改革事业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全县出现团结奋进、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

为了纪念建党六十周年，回顾光辉的战斗历程，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教育和激励全县人民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团结一致，振兴莆田，在两个文明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特选择能反映莆田各个革命历史时期（1926—1949）斗争情况的老同志回忆录二十二篇，汇编成册，作为党史参考教材印发至各基层党支部，供内部学习、宣传之用。

中共莆田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二月

目 录

莆田地区建党初期党史资料	陈国柱 (1)
广业澳柄革命老根据地斗争情况的回忆	陈蒲川 (38)
追忆邓子恢同志在闽中四个月兼悼陈天章	
汤军两烈士及芦尾村一役死难同志们	张兆汉 (44)
苏维埃时期外坑根据地斗争情况回忆录	蔡 扬 (54)
蔡明善同志和我在狱中斗争的经过	戴梦全 (57)
闽中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几次重要会议	
内容及其对全党工作的影响	黄国璋 (62)
回忆莆田常太地区1934至1937年的革命斗争	郑乌镇 (71)
常太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	黄联枢 (77)
闽中党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活动情况	苏 华 (80)
中共闽中工委在抗日战争初期活动的回顾	黄国璋 (89)
“泉州事变”纪实	杨采衡 (105)
闽中游击队北上抗日后发展变化的概况	杨采衡 (111)
莆田沿海地区革命斗争情况	林焕章 (119)
艰苦的战斗历程 (节录)	饶云山 (129)
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同日、伪、顽	
的斗争情况回忆	张 坤 (143)
奇袭涵江交通银行	郭永星 (149)
我参加袭击涵江交通银行	康金树 (157)
江口上林亭“截钞”情况纪实	康金树 (162)

解放战争时期闽中地区党的活动情况·····	林汝楠 (170)
怀念鹭鸶岛上的渔民·····	林汝楠 (178)
莆田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历史·····	林汝樑 (185)
闽中地委领导的福州工委情况·····	蔡光周 (200)

莆仙地区建党初期党史资料

陈 国 柱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晋江地区的党史，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根据你们所提出的提纲答复问题，再加一些补充说明，我想是可以搞明白的。但这只供参考之用，特此声明。

一、从“五四”到北伐军入闽前的革命运动问题

1、从民国七年许崇智入闽，粤军曾经打入仙游、莆田、涵江地方。那时虽是军阀混战时期，有一些所谓民军的武装，是在地主豪绅的手内，但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这运动。当时的口号是“闽人治闽”，“反对北狗统治福建、剥削人民”等等，包含进步的作用。我和我的哥哥即曾参加杨万顺的民军部队，在莆田打城多次，以后又到仙游和他们联络，大约有半年之久，粤军回粤，我们才回学校念书。

2、“五四”运动时期，我在哲理中学念书，当时莆田有学生会（这学生会掌握在豪绅地主的子弟手里）。但我们也参加了“反日”、“抵货”运动，记得我们（哲理中学）同学和我哥哥曾到涵江去搜奸商的布匹几百匹，分头抬回学生会，以后如何处理，则不知道。当时习演“文明剧”作反日救国宣传，都是由学生组织的。当时反对“二十一条条约”，我们组织学生军，每天

早上都执行体操,并且唱《国歌》:“五月九日,呜呼国耻!”莆田各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都有这样的行动,有时也派人到各农村讲演爱国道理,这样轰轰烈烈的闹了几个月,以后才沉寂了。这个莆田学生会会长是哲理中学生,会是直接受福建省学生会的领导,至于如何领导,我们年龄比较轻,则知道了。仙游的情况不详。

3、在这时期,莆仙人民主要的斗争,是民军运动,也就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虽然当时民军头子,是豪绅地主和流氓分子,但参加的都是贫困农民,因为贫困农民生活没有出路,只有参加“土匪”以反对苛捐剥削。反对北洋军阀的例子很多,可参看“莆田的民军运动”(《县志稿》)。

记得民国十一年(1922年),我亲自在常太区组织区学生会,反对北洋军阀的盐捐斗争,由于收税人员压迫太厉害,所以当时全常太的农民都起来反对,我们站在最前面,直接向王团长交涉,要求取消。王慑于民众的力量,不得已取消,我们得到胜利。在这常太的学生会为全区民众所拥护,于是我们开一个小学,这是常太区才有学生会的开始(按当时反对军阀收税,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个民众运动,为后来北伐时期区农民协会的基础(五卅运动那年,我在上海,福建情形未了解),至于当时的刊物,因为经济关系,我们没办。

4、我记得“五四”后,我曾在学校里看到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大概看到数期,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我思想上有些影响,但这种新刊物,莆田的青年看得不多,一直到我进厦门大学以后(1921年),我的同学施乃铸同志,曾送我关于马列主义的书籍三十多本,我带回家,交给朋友们看,现在一本都没有了。

同时林嵩龄曾在上海大学带回马列主义书刊多种，曾交给莆田朋友，于是设立图书阅览室，没有成功，据说此书现在还在莆田。总之同时虽然传播这些书刊，但因为新政治思想觉悟太低，影响不大。仙游的情况我不清楚。

5、莆仙这时期在外边求学的学生，并不很多，当时的青年学生，在北京各大学的只数个，在上海各学校也只有数个，在厦大有十多个。按厦大成立于1921年，上海大学成立于1923年，大夏大学成立于1924年。当时因为国立大学比较难考，进私立的经济又花费太多，所以多数到沪厦两地求学。大概1923年以后，莆仙学生有的在厦大念书，有的到上海念书，他的目的都是要求将来升官发财，只注意到学科本身，有的根本没有念书，花天酒地，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和注意了了无几。1924年厦大闹风潮，所有的学生，大多数跑到大夏大学，于是厦大学生残存的不多，所以泉属兴属的学生，在大夏比较多，在上海大学也有好几个。

上海大学本来是邓中夏和瞿秋白等同志办的，是当时党中央所领导的，其中教职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为上海青年学生运动的中心。其次有大夏大学、中国公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群治大学、东亚专科等学校。当时党的工作主要在于工人运动，所有主要党员，都做工运。本来党团工作有分工，党专管工人运动，青年团专管学生运动。所以各大学的学生，首先都参加团，到一个时期以后，才参加党或转党。当时许多学校的支部，都属团的领导。因而莆仙留沪的同学很多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上大的同学。1923年以后到了“五卅”运动前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公开的，当时以为是时髦，当然真

正接受与否，则看各人的思想是否进步，但真正参加组织的并不多。莆仙泉籍的学生，在上大的有陈伯达、林嵩龄、陈嘉谟（即陈少高，现在省戏剧研究会）、张剑，在夏大有陈国柱、吴世华，杨世宁、杨帮颜（现在永安）、周清水等，在交通大学有黄苍麟、等。大夏支部初成立时（团支部），闽籍学生有陈国柱、陈兴钟、杨帮颜、蔡珊等四人。而黄苍麟在交大参加团（与陆定一同志一起）。在上大的有林嵩龄、陈嘉谟、陈傑民等参加了团。在复大的有方泗英（方尔灏）、陈昭礼（都是福州人）。五卅运动后（1925年冬天）大夏的当局反动，当时有许多闽籍的学生跑到广州中山大学，在那里参加了党和团。

1926年我毕业后转回莆田，任中学教师，陈兴钟和方泗英已先一年回福州，开始建团工作，当时黄苍麟、林嵩龄尚未毕业，陈嘉谟也未毕业。杨帮颜、吴世华等都在广州。所以1926年北伐军入闽前，我即开始建立莆田党的工作，陈兴钟，方尔灏也在福州建立党的工作。入闽以后广州那一批学生，回到厦门、闽南一带开始建党的工作，因而福建党的建立，在闽南方面，由广东方面来的，闽北方面，由上海方面来的，这两方面都和我有关系（这段联系到下面再说）。

二、关于莆田建党、建团的问题

“莆田人民革命史”所记载的不是事实，有些是传开的错误。首先我所能回忆的来说：大夏支部成立于1924年秋天，当时是在我的房间里开会的，记的当时我住的附近资本家门口，排两盆菊花，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宿舍里开会。1924年这一年年假，我曾回家一次，主要是看我的母亲。本来是想赶回家过元宵（正月初九），到了十一日才回家，元宵已过（莆田风俗有行

讎叫元宵，不是正月十五日），当时团的负责同志，要我以全国学生总会名义，回家去宣传，带了很多印刷品，想找莆田学生会，没有找到，即在山里一带分发，其内容我已忘记了。不久即回沪。1925年底，我毕业于大夏，是年赶回家，因为要找教员做，结果哲理学校副校长刘丽川聘我任哲理中学教员，事先住在学校内，当时是一月底，其实以旧历算，也就是正月。我在上海回莆的时候向党中央报告，记的是袁孟冰同志同我接头，决定回莆建立地下党的工作，直接和中央（上海）发生联系，正月初开课，我所教的是高中的国文、社会学，当时的第三年级是陈天章、王纪修等，第二年级是陈兆芳，第一年级是陈德来、吴梦泽等。每我天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革命的道理，不久即得他们的拥护，于是我即把他们调来开会，记得当时有陈天章、吴梦泽、陈兆芳、陈德来等数人，要他们参加组织，当时是以团的名义。以后发展到王修纪、吴邛治（德化人）、翁祖武等数人，是为当时核心组织。这就是莆田党团混合支部的开始。这时黄苍麟、林嵩龄（即岳山）还没有回来。大概有一个月，第一年级有一个学生林汝潘（牧师的儿子）因为分数太少，向我捣乱，牧师的子弟们准备罢课。有一天果然罢课。他们罢课，我也就罢教，一面写信给广州的杨帮颜、任旭等，请他们替我找工作，得到他们的来信，广东正在需要党员同志，叫我立即去，于是我就辞职不干，当时教会里的人以为这样教员的饭碗不要，要赴广州干革命，大吃一惊。连外国籍校长章文新都大惊骇，以为我对他们毫无让进，结果我还是走了。当时经过厦门时，正是三月十八日北京惨案发生，在鼓浪屿还看到号外。到广州港外又值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被停在海上两天才上岸，就住在广州中山大学厦门同学的

宿舍里，找到了组织关系，由广州特区党委决定，派到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大概一个多月，大会结束，广东党方面派我和林伯渠同志接洽，到第六军第三团第三营作政治宣传员，于是到惠州横沥镇营部训练军队。到广州准备北伐，调我回省，要我回福建工作，准备迎接北伐军，于是转道到上海找组织关系，当时在上海和我谈话的是罗亦农同志，决定我回福建工作，并决定我回福州找陈兴钟。我当时住在南台旅社内，被北军密探前后监视，我把介绍信放在草帽里边，才找到组织转关系（大约是1926年5—6月间），决定我回莆田工作，继续当教员。又由刘雨川再聘为哲理教员，并兼省立四师、公学中学、涵江中学等校国文教员。于是在哲理将原有党团组织扩大起来，并在涵中建立团支部工作，当时陈天章、陈兆芳、吴梦泽等每礼拜日，派他们回去农村，组织支部，于是党的支部发展到农村中去，这是北伐军未到莆田前的情况。

我在广东没有回到上海以前，在广州福建籍的党团员，在广东中山大学曾开一次大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陈伯达当时也参加，这是我认识伯达的开始。当时还有过去大夏的同学杨帮颜、吴世宁、周清水等也参加。以后北伐军入闽后他们都回省在各地建党，厦门大学的党就是由罗杨才、吴世华等建立的，我和闽南各地党发生关系，就在这次大会中见面的。

1926年我们秋季开学时，大约在七、九月的时候，当时北伐军已进入福建。莆田的北军旅长董胜标要找我，于是我深居简出。不久，北军张毅由泉州败退，经过莆田，风声大紧，学校要我掩蔽起来，于是我才逃避到城内后塘姓方名晓园的教员家里躲避了两个礼拜。等北军退尽、北伐军未到莆田，我们就大肆活动，以国民

党县筹委会名义，大发传单。隔二三天张贞军队才开入莆，祝捷大会，当时完全由我们主持，发动各区农民参加，常太、广业、笏石，黄石和郊区的农民进城参加大会有十余万人，震动了各处，据说当时祝捷大会，民众参加，全省以莆田为第一，这是我们地下党工作的结果，因而我的名声大噪，极为当时国民党右派陈乃元、何子扬系所忌，以致“清党”被追辑原因之一。这时黄苍麟才回来，在涵中当教务长。林嵩龄也回来了，在公学中学当教员和我发生党的关系，这时期（1926年）邦尾才建立党的支部，支部书记林清汉。

当时莆田各地都有支部，记得邦尾以外，广业渔湖溪（夹浜村）有一个支部，沃柄村有一个支部（陈蒲川等），常太山门有一个支部，郊下一个支部，还有其他的我忘记了。当时有的是党团混合的支部，有的是党的支部，有的是团的支部，因为大革命初期支部干部没有那么多，又都是新建立的，没有分那么清楚，大概农民多的是属于党的支部，学生多的是属于团的支部，因为大革命前，一般的党团没有分那么清楚，1938年延安时中央决议，凡是1928以前的团员皆承认为党员，这是一个例子。其实当时各地的组织并没有现在那么严密，当时党内教育工作，由于斗争忙，大家都没顾到，这是事实，有的地方，连过组织的生活也很少，党支的支部生活，是到“清党”以后才严格的执行起来。

黄苍霖、林嵩龄入党的时间，是“五卅”运动前后，具体的情况我忘了，他们都没有在哲理教书。到了1928年以后，当时党要党员同志直接参加农村工作，脱离生产，他们不能实行，于是就不理他们，但并没有公开地开除他们的党籍，从此后，他们的关系断了。有一个林龄烈士牺牲，是他的一弟弟，名字待查，不是

林嵩龄本人。黄经芳，即黄震（现在农工民主党的干部，据说已脱右派的帽子），是仙游东乡人，北京师大的党员，与江西的邵式平同志同时，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的名单中就是他。仙游的王青圃（于洁）同志是他的亲戚，由他的关系，我才介绍于洁入党，黄今秀是他的学生，被林寿国枪毙。

邓老的回忆，可能是闽西一带的组织情况，我记的当时方尔灏同志当面和我说：莆田有几个支部，比县级党委小，但又比区级党委大，因之决定为特区委（1926年冬）。按当时党的组织名称：广东为广东区党委，上海为上海区党委，北京为北京区党委，到国共分家后，才定名为省委，如江苏称江苏省委，河北称顺直省委，东北称满州省委。区党委以下为特委，特委以下各县有的叫特区委，有的叫县委，北阀军入闽前，我没有听到有县支部的名称。省委、县委、市委的名称是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决定的（老实说，北阀军入闽之前，除了福州外，各县都没有党的完整的组织，这情况我是明白的）。因此所谓莆田的三人小组，不是事实。记得“五卅”运动后，上海市各地才建立区委，当时沪西区是由徐伟同志负责，所以特区委的名义，是由这里来的，这是方尔灏同志当面决定的，毫无吹牛。

莆田特区委的领导者，当时是陈国柱、黄苍麟、林嵩龄、陈天章、陈德来，没有具体分工，总负责是陈国柱。方泗太这个人，我们不知道，方尔灏别名叫方泗英，又名芳草，他从没有到过莆田。当时各地支部，我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是秘密的组织，我们没有统计，由各负责者自己知道，比方广业是吴梦泽管的，涵江是黄苍麟管的，郊区是林嵩龄管的。

我到福州是福州光复后不久，由方尔灏、陈兴钟写信要我去。

到省后，当时首先由方尔灏找我个别谈话，首先询问莆田的情况，我也没有具体准备，只随便谈谈，当时仙游的陈嘉谟也在座。记得当时我到方尔灏家里去，适值方的母亲做寿，方一见母亲（早晨）就给母亲拜下，我们也不得已就作揖，似乎是贺寿的意思。说话完以后，方带我们上街一溜，到书店里看到一批新书，方要买书，又没有钱，我就给他五元钱买书，看他很穷的样子，我还劝陈嘉谟也给他钱，因为我当中学教员，最有钱，所以我毫无吝惜。

这一回见面以后（1926年底或1927年初）约有二、三日，我们就到党委机关里开会，记得有潘作民（建瓯）、陈嘉谟、陈国柱和陌生的二、三人，当时机关里，我看到陈兴钟是组织部长，陈昭礼是宣传部长（在看秘密指示用在药水写法帖后面），林淑玉（蔡珊老婆）妇女部长，还有陈芝英（陈兴钟老婆）等人，开会的时间并不长，说一些如何发展组织，做好国民党工作，深入下层运动等工作。当时也有政治分析，内容已忘记得一干二净。在我的印象里觉得很空洞，因为这批同志都是上海的熟人，都无实际经验，也没有群众基础，情况也只能是这样。

当天晚上，我又到东路军政治部去聊天。这政治部主任是江董琴，党员，永定人。在那里遇到尚友、蔡珊、帮颜等熟人，我才知道蔡珊也在福州。

蔡珊，温州人，上海大夏支部的同志，曾在水沙渡做职工运动，时常和项英同志顶嘴，据说在福州时叫陈名哲，大概是党的负责者之一，我们开扩大会议时他没有出面，有人说他是党的书记，有人说方尔灏是书记，当时内部有宗派斗争，我不清楚，此人国共分家后投入托陈取消派。林淑玉是他的爱人，1929年我还上海见过他们几次面，以后不知下落。我们当时聊些不紧要的

天，因为他们催促我回莆，再等一天，我就由福州小路回莆田。因为恐怕右派对我暗害，不敢走大路，由永太转莆田大洋地方回到广业广宫住夹际附近一个小镇，翌日清晨，回到莆城，同时除党内同志外，没有人知道。

莆田G Y的组织，是在组织党的同一时候，即是1926年正月间，我上面所说的哲理中学那个支部，以后分开了。当时党团的分别并没有那么清楚，记得陈德来、翁祖武等负团的主要责任，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学生方面，党员负责农民支部和领导国民党各区分部，团员等做学生青年的工作。

这里必须说到工人运动。由于莆田没有产业工人，城内和涵江虽有少数鞋工、运输工、店员等，但多数是在地方的封建势力和豪绅掌握下，有一些是“雄班”即流氓分子掌握着，阶级觉悟很差，远不如农村贫雇农的纯洁、勇敢。所以我们并不重视，也没有力量去兼顾。做工会的工作者，是由国民党左派分子陈震（醒亚）负责，林清汉也参加了，但毫无成绩可言。因为我们主要的力量放在农民和青年学生运动中去，不是我们没重视工运；因为我们都是城外入，城里的职工和涵江的职工都是和当地的上层有联系，我们没有力量打入，掌握不住他们，做得不好，反受利用，所以我暂时不太注意。

关于仙游的建党建团的情况，在北阀军入闽以前，我不清楚。我所知道仙游在民八年以前曾有一个入到法国勤工俭学会，在法国留学和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在巴黎参加了党，以后回国，大概就消极了。另则仙游当时有陈嘉谟、陈侃、李拱辰等人在上海念书、陈嘉谟在上海大学，才进了团，同我有关系，是林嵩龄告诉我的。在福建省扩大会议时，他是仙游的负责者，但没有什

么实际工作，以后又派回仙游，当时的工作情况我不知道。还有一个郑傑民也是上海大学的团员，此人以后在海军林寿国里当政治部主任，叛变了，以后是国民党的G G分子，曾在福建当民政厅长，改名为郑挺秀，是个有名的人物。陈侃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当时也冒称左派，自称是共产党员，其实是假冒的。这批人如张兆煊、张驰、李果、李拱辰、陈炳中、林仲壬被仙游人称为“乌派”，名誉极坏，其实连“右派”都不如，“清党”以后都做国民党的要人，以后多数是G G的系统。在北京读书的有黄经芳，别号纬庭即黄震，解放后是莆一中有名校长，以后在农工民主党。黄经芳是北京师大的党员，参加南昌“八一起义”，随军到东江，失败后到莆田，还是党员，我走以后，是莆田党的负责人，对莆仙的党，有一些贡献。比方王青圃同志是由他介绍给我的，莆仙的第一次武装运动，是我和他秘密进行，他派他的妻弟郑纪，第一次做了跳山头的运动，郑纪以后被国民党枪毙。我们当时的根据地是在笏石区的店头，即现在笏石区的簪山大队部，这是莆田第一次游击队的开始。

仙游这些人中间，陈嘉谟、黄经芳确是党团员，在北阀军入闽后，确在那里活动，至于建团建党是说不上的。

一些历史资料说到的福州团地委曾派人到莆仙工作，那不是事实。但据我所知道，当时莆仙的革命运动，不但没有S Y和G P的消息，即国民党的左派影响也没有的。马念农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以后我们在那里活动时，这些人根本没有出面。莆田有一个马秉彝，是黄埔五期的学生，是孙文主义学派，曾带队伍到哲理中学去抓我而扑空的就是他，此人以后大概是军统，解放后莆田镇反时候被镇压了。

可是仙游正式建党的时间，是1927年11月。本来在北阀军到仙游的时期，据说陈嘉谟曾在那里活动，他拿一本签名簿，到处公开征求共产党员，凡签名的即是共产党员，大概郑傑民、张驰、李果这些“乌派”的人物，大多数都签名。可是陈嘉谟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乌派”也不相信他，有时人们还玩弄了他，于是陈侃、张驰、李果等都挂了名，大肆活动，但只在上层知识分子中轰动了一下，根本没有下层基础，结果“清党”一来，他们都一哄而散，转而靠近了林寿国土匪帮，都做官去了。郑傑民曾和我跑到上海，我到武汉找党，他就在上海找反动派，回到仙游，以后的情况就不明白了。

1927年下半年，我回到漳州省委工作，参加省委，阴历九月初三日我母亲逝世，告假回家奔丧，经省委批准，要我回莆仙整顿党的工作，重新建立党。我于九月初六日，由江口上船，秘密回家，即害大病，等到十月底安葬母柩后（在奔丧期，当时党是宋耀华、陈天章、吴梦泽等负责，我因不取到城，和他们在家里秘密讨论布置工作），以为莆田不能安身，由黄经芳、宋耀华等决定到仙游，在仙游县中学以教书为职业，重新建立党的工作。

到仙游后，住在县中附近金石山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在这期间，我们到处了解情况，当时陈德来、曾天义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以后同他们混在一起。我向陈嘉谟问过去共产党的情况，才知道他们都是假的，不但没有基层组织，甚至连党的秘密机关都没有了。在这期间，我认为他们都不可靠，连陈德来等（已经消极了）我都不承认他们是党团员，李拱辰、张驰等更靠不住，我想非重新由个别方面等找人发展不可，于是我到东乡榜头地方王青圃家里，看他家里生活困难，又决心革命，于是我就介绍他入

党，由他在那里发展组织。结果他找到陈博、王××等十六人，多数都是农民，成立了秘密组织，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另外在城外西门兜，我又找到我的学生许淑修，介绍他入党，由他发展，以后由许淑修到一个陈××（此人在福州时曾写信给我，名忘记），又找到南门外乡下一个姓郑的，共三人成立一个支部。当时在1927年4月间，我在兴太山区上宫地方避难时，在那里找到了林锦堂、林步庭等八人，成立一个支部，林步庭现在上宫工作，去年还写信给我，这时仙游才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当时成立了仙游县委，我自任书记，王青圃（吴梅）任组织部长，许淑修任宣传部长，林步庭是县委委员，当时仙游才正式成立了党的组织。于是所谓过去陈嘉谟等的仙游党的组织，无形取消，我当然没有告诉他们，这是1927年11月——12月的时候。仙游党的正式成立是这个时候，于洁（王青圃同志）入党也是这个时候。许淑修这个人还在，以后如何消极，我不知道。郑某以后当“土匪”，被林寿国枪毙了。他当“土匪”是我们决定秘密做武装运动的开始，他有一种秘密的药方，放在米饭里边，一吃下就同麻醉药一样，人们不能动弹，倒在地上，眼睁睁地看人缴他的枪。郑混入某股土匪队里，当了伙夫，用药结果在队里边缴了二十支枪，自己搞起来，以后失败被枪毙了。陈博等以后的结果不详。王青圃在1928年春东乡反鸦片捐暴动失败，黄新秀被枪决，跑到莆田，即在店头村起义。此时还有林植，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在上海由我介绍入党，回到仙游，也被枪毙了。大概继郭寿奎以后被枪毙的都是仙游县委书记。

1928年春，由于某中学校长黄良骏（乌派人物）是上海大夏的同学，答应我在某中学当国文、历史教员，不久又当某女中的